一、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在地区发展研究中，人们往往遇到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比如如何对待“史料不全”、是否只有等待它的挖掘齐全？再有即令史料较为充分，又当如何对该地发展水平或类型下一断语？由此还会产生一些问题：为何某一地区发展较快，而另一地区却再难以提高？推动或制约它们的因素又是什么？等等。因此，如果能够提出一些‘理论’或‘模式”,对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会有所帮助。但是，长期以来，有关理论的建设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人或是“想当然”,或是将其他某种文明(如西方的模式)用为理论指导,反而代替了中国理论、中国学的自身建设。这与中国经济史和地区发展研究的进展是太不相符了。

本文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打算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或类型，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区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第一个也是所谓最‘落后’的即是‘不发展’阶段(或地区),依次的几个可以估且称为‘发展中’、‘高发展’和‘发达’阶段（或地区）。它们各自都具有鲜明的人口和经济的特征。如在生产水平上,它们依次为 耕地的有限开垦、充分开垦、开发之后和农业之外；相应地，在人、地关系方面也有一系列的特征可以举出。此外，还有一些核心的“灵魂性”的特点也许更值得注意。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区分和理论设立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是因为它们有用和便于说明问题，并不带有什么绝对的意义。

本书将按上述类型分为四个部分。在每一部分里，首先要举出相应的实例，进而归纳出该类型的特征，并指出它与其他类型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区别。随着这样一步步的叙述，不但要展示出有关的正面论点，也要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所谓中国经济‘长期停滞’、‘发展’“不合理”，终至‘走投无路’等一系列误解予以澄清，以重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分析，从理论上说应包括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从史料角度说至少也要包括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但本文仅是一个从清代或从近 500 年历史做出的观察。它不是对中国数千年经济发展的通盘解释，也无意对各个地区做出所谓先后高低的排列。

一

为了考察中国传统经济的“不发展地区”的状况和问题，可以首先观察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地区”，然后再做类型的分析。

站在从清代观察的角度，清初的四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明清之际同受战乱摧残的西南其他几省不同，四川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地区，在秦汉和唐宋时代都有过高度的发展。但清初的四川，却常给人一种一切“从头开始”的印象。据官方人口统计，康熙十年（1671 年）全省有 5 万来户、10 万来口，康熙末雍正间约有五六十万户①，几乎降至 18 直省的最末一位。在四川各县，户数没有满万者，一般多者千余户、少者三五百户，甚至有几户、几十户的②。由此可见，清初四川人口稀少。而人口稀少，正是经济落后地区的第一个特征。

与人口稀少相伴随的另一个特征是田地抛荒。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四川省耕地只有 1 万余顷（顷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 顷＝6.666 7 公顷）。此数字虽不准确，然而与雍正间清丈前同类数

① 雍正《四川通志》卷 5，嘉庆《四川通志》卷 64。

② 四川有关各县方志，如灌县、崇宁、简州、崇庄、邛县、丹麦、井研、江津、丰都等。

字相较，只居 8% ① 与明代后期数字相较，只居 4% ② 。从各县计，最多者千余顷，一般多不过二三百顷，大量州县仅有数顷或数十顷③。

与田地抛荒紧密关联的，是开垦只及平畴④；“高坡大麓，悉皆荒弃”⑤或占而不耕；“名熟实荒”⑥；甚至雍正、乾隆之交，成都沃野之外，“有休一岁或休二岁或三岁更耕之者”⑦；或“以地力易尽”；“有弃熟田别垦者”⑧相应的是“地价至贱”；“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⑨这些状况共同交织出一幅田土不能尽耕的生产景象。

以上几点可合称为“土旷人稀”。一个农业社会，在人口较少，而主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相对较多的情况下，需求是不难满足的，所谓“人数至简，供过于求”⑩，描述的即是这种状况。另一方面，在王朝鼎革、战乱饥疫交相为祸之际，往往产生严重的供求失衡，致使生产不敷所需；但一时需求的下降程度，往往要比供给方面为大。因此，随着一个较为短暂的“供不应求”时期之后，便会出现一

①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上海），380 页。

② 赵岗、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123 页（联经出版公司，1982，台北）。

③ 四川有关县志，如温江、新津、什邡、眉州、丹麦、仁寿、井研、夹江、南溪、珙县、兴文、泸州、荣昌、涪州、南充、西充、蓬州、营山、仪陇、广安、岳池、邻水、中江、遂宁、苍溪等，及各府记载。

④ 乾隆《珙县志》卷 4 皆曰“平畴甚少，生谷甚微”。

⑤ 康熙《丰都县志》卷 1。

⑥ 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卷 5：康熙时“听民自占垦荒”，“有一族站（占）田至数千亩者，各树表以分疆界，谓之插占；然所占实不能尽耕也”。

⑦ 雍正《四川通志》窦启英序，见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74（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成都）。

⑧ 乾隆 51《盐亭县志》卷 1。

⑨ 民国《南溪县志》卷 2。

⑩ 民国《南溪县志》卷 2。

个“供过于求”的阶段。供求之间的这种关系,或简称之为“需求不足”,是“不发展地区”经济的又一大特征,也可以说是贯穿其各个特征之内的核心特征。

在这种状况之下,“地不尽利”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是此类地区的又一特征。它与前述“田地抛荒”紧密相关,因为大量土地荒弃,已耕地亩自然无须精耕。这两者也可以视作侧重点的不同,它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1)用工不力:“向因谷贱伤农,不甚力于南亩”①;“疏于耕作”②;“人力不甚劳苦”③;“初止播插,不勤耕耨”④;“一经栽插,不事耘耨,直待秋成,谓之靠天”⑤;“耕种之法,即老农亦不知讲习,春间播种于地,听其自秀自实,谓之天种天收”⑥。

(2)水利无修:“不论倚溪就涧,挹岭环山之田,大都全赖天雨,素乏塘堰”⑦;“专恃天时”⑧;“凡高坡大麓”;“尽皆荒弃”⑨。

(3)不甚施肥:“川人鲜有积粪”⑩;“川中民动曰:下粪则田肥苗茂,禾多损坏,遂不用粪。”⑪

这种“落后地区”经济的再一个特征是种植单一。例如,长寿县康熙时“只知种稻,不艺杂粮”⑫。岳池昔时“邑止种稻,粱菽无

①乾隆《高县志》卷1。
②乾隆《永川县志》卷8。
③乾隆《三台县志》卷1。
④乾隆《垫江县志》卷1。
⑤康熙《丰都县志》卷1。
⑥乾隆51《盐亭县志》卷1。
⑦乾隆《岳池县志》卷1。
⑧乾隆《三台县志》卷1。
⑨康熙《丰都县志》卷1。
⑩乾隆《江津县志》卷6。
⑪乾隆《罗江县志》卷4。
⑫康熙《长寿县志》卷6。

多”① 垫江“邑止种稻,粱菽无多,其他概不树艺”② 江津至康熙末始有茶的种植③ 德阳“无甚出产”;“近来蚕桑之利渐兴。④”应该指出,所谓“单一”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就比较而言。但显然的,“不发展经济”是把“食”(或加上“衣”)的需求的初步满足作为主要目标,因此显示出主粮作物居于第一、不种或少种杂粮、经济作物甚弱的特点,这与以后要分析的较高发展阶段有着鲜明的对比。

“落后地区”经济的其他特征还有风俗简朴、生活低下⑤,工商业不发展等。总之,这是一种生产远不充分、生活水平低下,而又缺乏发展刺激的状况。

借助于“落后地区”(如清初四川)的例子,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征,有助于分析典型的“不发展地区”。相比之下,四川是一个开发既早、又曾达到较高发展水准的地区。清初的“大倒退”,毕竟是一时的现象。所谓“不发展地区”,严格地说,主要是指一些长时期中始终处于不发展状态,即在客观上虽有条件(如耕地充足),但却“满足现状”不求发展的地区。因此,在经济水平之外,还需注重经济形态的分析。

在清代 18 世纪以前,广西是一个一直处于不发展阶段的地区。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初年,广西人口始终未超过 50 余万户、200 余万口的水平,处于一种“生齿不蕃”、“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况⑥;即令人口有所增加,增长率也是很低的。这与以后的发展阶

① 乾隆《岳池县志》卷 1。
② 乾隆《垫江县志》卷 1。
③ 乾隆《江津县志》卷 6。
④ 乾隆《德阳县志》卷 7。
⑤ 如“居民皆贫,三冬止服单衣,不衣绵者甚众”(康熙《涪州志》);“民家多盖茅屋乾隆后多换瓦顶等(乾隆《峨眉县志》卷 3),又见下节有关段落。
⑥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4;《清史稿·韩良辅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段有着很大的不同。

除人口状况之外，这一时期广西地区经济的特征还有：

（1）田不尽耕 宋代“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①]；明代，“平原旷野，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 獞人所种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②]；以至清初仍是一派“土旷人稀，多弃地”的景象[③]。

（2）地不尽利“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 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④]。山衡水田，十种一二，“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遗利可惜”[⑤]。“灌溉不时，鉏耨易倦；桂林而下多不辨菽麦，至今粮莠杂生，亦不一顾也[⑥]。”所出祇米谷“；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得高卑宜植良种”；“不知陂渠塘堰而资蓄泄”[⑦]。“土瘠民贫不事力作”；“株守度日而已。”[⑧]

（3）工商业不发展“居人不知贸迁”；“不习女红，至不识机杼作何状”[⑨]；“专事耕作，别无生活。”[⑩]

（4）消耗性消费：“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⑪]；“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⑫]。“秋收稍余，则都里亲戚日招呼

① 《岭外代答》卷 3。
② 王志性：《广志绎》卷 5。
③ 《清史稿·韩良辅传》。
④ （岭外代答》卷 3。
⑤ 《广志绎》卷 5。
⑥ 万历《广西通志》卷 3。
⑦ 《清史稿·韩良辅传》。
⑧ 闵叙：《粤述》，《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卷 7。
⑨ 万历《广西通志》卷 3。
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6《广西》2。
⑪ 《岭外代答》卷 4，清初四川也有很多类似记载。
⑫ 《岭外代答》卷 3。

往还，恣其饮啖；逮春则糜啜 以 哄 ”；“ 苟 活 一 时 ”①”“ 岂偷生无积聚者 ?”②

（5）生活水平低下：“ 广右之徒无所芬华，男女布素，女绝刻缕，冰纨绮绣无所用之 ’③“；富室大家复之以瓦，不施栈板 ”，“ 目光穿漏不以为厌 ”；小民垒土 墼 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 或以竹仰复为瓦 ”；“ 四壁不加涂泥。”④

（6）赋入不敷所需：“ 地利多遗，财用不足 ” ⑤“；广右财赋不足当东吴一大县 ”；“ 计一省之赋不足一省之用。’⑥

（7）需求限制生产：“ 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 ’⑦

在这种状况下，广西不但农业生产备受局限，即其微弱的农家纺织业也难以发展。如宋代广西 “ 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 苎 尔 ”；“ 然布之所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 ”。政府曾“ 以钱、盐折变收市之 ”，不及二年收购量便增至三十余万匹⑧。凡此种种，即一方面“ 地利物产，优赡自足 ’⑨，物产丰饶，易于自足；一方面因需求不足而主产品价贱、难于出售，政府收购扶植保护，以至生产终于不得发展等，都表现了不发展经济的特点和反映出不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

清代 18 世纪之前的广东（不包括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也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广西》·2。
② 万历《广西通志》卷 3.
③ 万历《广西通志》卷 3。
④ 《岭外代答》卷 4。
⑤ （宋史》卷 423《林勋传》。
⑥ 万历《广西通志》卷 17。
⑦ （岭外代答》卷 4。
⑧ （宋史》卷 284《陈尧叟传》。
⑨ 张瀚：《松窗梦语》卷 4。

可以做一例证。广东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广州及其周围地区与该省其他地区差距很大。这在明代人口分布图上，表现得非常明显[①]。明代后叶，珠江三角洲等地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化，而广东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

（1）垦田〔韶州〕"土旷民稀"，〔英德〕"择沃土以耕，而于硗地多不用力"，〔雷州〕"城东良田弥数千顷，……间旷成荒"[②]，〔廉州〕"平原旷野，……成田者十仅一二"；"要皆土广人稀故也。"[③]

（2）耕作："所种只水稻一种，黍稷麻麦俱无；其田半没半荒，稻禾十不七八。询之耕民，皆不粪不耘，撒种于地，仰成于天，然犹亩收三四石"；"数岁力薄，则易其处，又数岁而复之，故熟田常少，荒山常多"；[④]"下种后，悉听于天，农夫只问刈获已耳"。[⑤]〔廉州〕"喜逸惮劳"；"皆不耘不粪，仰成于天，又仅水稻一种，诸谷不植"；〔韶州〕"农不力耕"；"多惰农"。[⑥]

（3）其他经营〔琼州〕"专事田园，无他生意"；〔廉州〕"生计最拙"；"山林川泽，……不能取用"；"妇女则终日嬉游"；"不绩不蚕"；〔韶州〕"重耕稼，少商贾"；"商不富，贾不巨，工不巧"；"工无良技"，"良工善器多取诸外郡"。[⑦]

（4）消费："闾阎小民取给衣食而已"；"习尚简朴，不事纷华"；"市井贸易自日用饮食之外，珍奇之货不售焉"；"远乡下里多种绿豆以酿酒"[⑧]；"米谷最贱，马、豕之属，日食粥糜。"[⑨]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图 19（三联书店，1983年，北京）。
②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③ 《知州林希元奏复屯田疏》，《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1。
④ 《知州林希元奏复屯田疏》。
⑤ 王临亨：《粤剑编》卷 2。
⑥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⑦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⑧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⑨ 《粤剑编》卷 2。

总之,是地不尽利,人不尽力,业不尽营,物不尽用,需求狭窄,供给有限。呈现出一幅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景象。

明清之际，除东北及西北诸边和台湾外，在经济上仍处于或近于这种不发展状态的,可能就是包括四川、湖广、云贵、两广在内的中南和西南地区了。长时期中这一地区土旷人稀，“米贱田多，无人可耕 ;人亦不以田为贵。”① 所出除米谷外，多山林水泽之特产，以及自然矿产珍奇之货。② 故“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 ”,所贩不外‘ 匾栗蔬果丹砂铜锡竹木之器 ”,及‘ 珠玑犀齿毒瑁金翠 ” 之属，其他物产无足称者。③ 广东‘ 人文自宋而开 ”,④ 开发较早，但到明代尚与滇南同被视为边地、“瘴乡 ”、谪降迁客之区。⑤ 故称岭南‘ 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 ”;斗米十余钱,鱼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道无乞人，户不夜闭 ”⑥;“家虽无十金之资，而用度自足；负担者苟持一钱出市，可以得饱。”⑦ 这种经济上低水平自足的状况，若没有新的刺激或压力，恐怕便无以打破而会一直持续下去。

根据 18 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把“不发展经济 ” 的特征归纳如下：

（1）人口稀少：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时期内人口增长率很低。影响人口增加的因素有：开发程度较低，社会组织不健全；政治不安定，秩序混乱；尤为重要的是气候地理环境的作用，如“江南卑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 4。
② 《周礼·职方民》、《汉书》《宋史》之《地理志》“荆州 ”诸条。
③ 《松窗梦语》卷 4。
④潘耒：《广东新语序》。
⑤ 《五杂俎》卷 4,《粤剑编》卷 2。
⑥ 《五杂俎》卷 4。
⑦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湿,丈夫早夭”;[①] 水土恶劣，“人生其间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齿不蕃,土旷人稀,皆风气使然”;[②] “广人皆半羸长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③] 粤中“林木荟蔚,虺蛇噬吸,烟雾纵横”;[④]“天多瘴雾,地多虫蛇”;[⑤] 两广各有大、小法场;“言(毒瘴)杀人之多也”;[⑥] 又多虎兽为患，杀伤人畜。[⑦] 凡此，都不利于人口的增长。

(2) 田不尽辟：表现为所有可耕地土远未尽行开垦，或只耕平畴、近水、肥沃地土,而硗地、旱地、坡地及山林则多弃而不顾。

(3) 地不尽利 表现为浅耕、漫种、不耘不耨、少用畜力、不施肥、不修水利、旱涝由天等,广种薄收,粗放经营。

(4) 种植单一：表现为种植以主粮作物为主，很少二茬或其他作物，复种指数低，经济作物生产薄弱，忽视山林水泽出产等。

(5) 人不尽力,以及严重的“就业不充分”这可以从较为单一的经营、粗放的耕作及农暇时间的不充分利用等现象推断出来，表现为各地所记载的“农人惰窳”,[⑧]“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等。[⑨]

(6) 工商业不发展：表现为以农业耕作为主，很少其他经营；工则技术低下，甚或很少女工；商则无巨贾多小贩，交易范围有限。

(7) 风俗简朴，生活低下：表现为陋居、布素，经济目标亦不过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岭外代答》卷 4。
③ (岭外代答》卷 3。
④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 15.
⑤ (五杂俎》卷 4。
⑥ (岭外代答》卷 4。
⑦ 如唐代江南因普遍发生虎患，朝廷曾派人至江淮传授捕虎办法（陈正祥书， 9 页);宋代虎患;“广中州县多有之”;“时出为人害”(《岭外代答》卷 9);清初大破坏之后的四川，以及新开辟的贵州，也颇多虎患的记载。
⑧ 康熙《遂宁县志》卷 1。
⑨ (岭外代答》卷 3。

是衣、食等基本需求的初步解决等。

(8)消耗性消费，表现为在基本生活用品上消费浪费，多酿嗜饮，有余尽售，不留储备，也无其他更高投资追求等。在心理上为一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状态。

(9)税收薄弱，赋用不足。

(10)需求不足，压抑生产：表现为主产品价格低下，艰于出售，社会购买力低，以及各方面生产的不充分。

以上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一个层次——不发展经济的各种特征。如前所述，这类经济地区到清代18世纪以前还占有中国农业地区中极大的面积。它们主要是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至于华北和中原的广大地区，虽然自宋以来无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发展水平却要高出许多，所以不能归入此类（它们多数可归入第二层次）。

与各种流行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论点相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早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是逐渐提高，有其自身的步骤，并一直"保有余地"的。例如在耕地开垦方面，它是随人口增加而不断拓展，从华北逐渐走向江南、华南、西南和东北，一再形成较高的人口密度和高密度人口经济，一再开垦新的耕地，这样一步步地拓展到整个中国；以至耕地统计中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在18世纪以后200年间才得以垦辟的。[①] 正是这样的历程，使中国传统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千年中始终葆有新鲜的活力和一再达到新的发展高峰。对于这一历程及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实有必要给予重新认识。

在不发展经济的特性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它的不发展性质。那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境况，加上低水平供给的易于取得，以

①关于耕地统计数字的问题，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准学刊》第五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及人口增加较慢等因素，造成了这种地区长期“不发展”的局面。这种供需间的关系和自足无他求的状态正是不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以带动其受到压抑的、不得发展的生产。没有这种变化，这些地区就会长期地继续处于不发展状态之中，而难以起步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方面，无论是扩大税收（如宋以后的江南）、增加收购（如宋代广西），从史实观察，都不如人口增加的作用为大。例如清初的四川即是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打开了局面的。当然，随着人口的普遍增加也会带来地区间贸易的扩大，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展，这点在 18 世纪以后广西和四川的发展中都可看出；但是，这种交流关系的扩大和提高难道不是随着人口在各地的普遍增加才出现的吗？这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恢复时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可以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一层次分析中，存在着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从经济水平方面（如川、桂间的许多共同点），一个是经济形态方面（如川、桂的不同点）。本文主要强调了后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和实际应用中，也许是更多地会从前者着眼。事实上，大多数典型的不发展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后来也相继步入了发展中的阶段。鉴于不发展地区的最主要经济特征即是土地的有限开垦，下一个阶段的任务自然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人口的迅速增长。

二

传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发展中经济”。与“不发展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已经开始起步，进入发展之中；它所能达到的水平，虽然逊于其后的‘高发展经济’，但却不是‘低度’的，而可称为一种中等水平的发展。这些阶段划分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

分，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划分阶段、类型和找出各自的特点，以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而决不是要把发展的连续过程割裂开来。事实上在各阶段的衔接点上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某些特征几乎是相同的；有些只是到了稍后时期，才与上一阶段有了显著的区别；甚至有些特征可能会贯穿所有阶段，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找出中国传统经济各个层次间的共同特点。

与不发展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开始较快地增长，土地大规模的增垦，农作由粗放迈入粗耕细作，作物品种增加，经济领域展宽，商品性农作较前有所增进，① 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句话，它已从“不发展状态”开始起步，进入了发展的头一个重要阶段。

这里首先仍以四川为例。这是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连续发展的例证，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不多见的。在清初的一个时期之后，四川人口迅速增长起来，从康熙中至雍正时的 50 年里年增长率约为 5%。② 其中虽不无统计上的问题，但当时人口增长之快却是无可怀疑的。四川人口增加有着移民的因素，但在别的省份也不乏这类例证，甚至可以说几乎各个朝代的“恢复时期”都是如此，即与发展的稍后时期相比，这一较早的时期人口增加最快，以后则逐渐降速。③ 人口的这种增长表示出该地区经济已经开始起步，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它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第一个特征。

土地开垦的增加是发展中阶段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因为战乱之后存在大量的“熟荒”地亩，开垦的速度在“恢复期”中也最为迅

① 决不应说不发展地区没有商品性生产，如宋代广西就有不少数量的米谷输出，参见《岭外代答》卷 4。

② 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124、138 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 年，北京）。

③ 关于清代及以前几代的增长情况，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初期的中国人口”，《平准学刊》第二辑（1990 年）。

速。如四川耕地在明代已达 40 万顷，而在清初只剩有 1万余顷，表明在一场战乱之后土地抛荒可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但数十年后四川垦田即已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并指向那些生荒地的开垦。当然，在无论是中国各省还是全国的耕地面积研究中，仅有统计数字是很不可靠的，① 也不足以说明各地开垦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依赖其他方面的史料。如方志记载表明，乾隆年间合州“田园庐舍已称辏集，无荒山旷土之忧”②；珙县“野无旷土”；“山巅水湄亦遍垦种”，③ 甚至位于北部山区的太平“近年来（移民）携眷来县挖山种土不绝”，④ 昭化为方便开垦，“深山中有数百年物，辄焚之。”⑤ 这些表明，四川土地的开垦确已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且已及于“山巅水湄”“山头地角”“尺寸”之地，大有将所有可耕地土不尽行垦辟不止的趋势。

与此同时，土地的利用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首先是勤于农作：“旧志谓土沃民逸，疏于耕作，名曰靠天，今殊不然。本业家士女无遗力，肥硗无遗利，耕耘收获踊跃争先”；⑥“向因谷贱伤农，不甚力于南亩，迩来生齿日繁，谷值日增，人知宝爱稼穑，……垦荒剪莽戮力耕桑”；⑦“今生齿日繁，民皆知勤农重谷。”⑧

其次为兴修水利：“蜀惟成都府有都江大堰资灌溉，其余山田悉苦旱”乾隆十八年川督“奏饬通省勘修塘堰，引灌山田”，使新

① 总起来说，耕地数学极不准确，其不可靠的程度，使不顾其准确与否而寻求可比价值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详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的第二章第六章的有关段落。

② 乾隆《合州志》卷 6。

③ 乾隆《珙县志》卷 4。

④ 乾隆《太平县志》《风俗》。

⑤ 乾隆《昭化县志》卷 2。

⑥ 乾隆《永川县志》卷 8。

⑦ 乾隆《高县志》卷 1。

⑧ 乾隆《垫江县志》卷 1。

都、芦山等十州县“悉成腴壤”;[①] 其先后并有雷波、金堂、彭山、绵州等地亦疏凿水道，修筑堤堰，决渠引溜；或“开良田数千亩”，或“灌下游山田数万亩”;[②] 又岳池“近来劝谕开塘池置车戽”;[③] 石泉“因地注水改田者踵相接”;[④] 珙县“相度地形，增修塘堰，岁收几倍于昔”;[⑤] 罗江等地于“筑堰开塘”、“作水车灌高田”外，更创行‘冬水田’,于山地水源不足之处‘蓄冬水’做田;“化高为平,化瘠为肥，化旱为水。”[⑥]

其三为积粪施肥:“耕农之事粪壤为急”;“所以变瘠为肥者,惟在积粪”;“故曰惜粪如金”,而‘粪田胜于买田’积极讲求粪壤之法,[⑦] 尤以‘猪粪为上’;“不耕者市之得钱”;[⑧] 改善绿肥用法;“尽地之利”。[⑨] 较以前“鲜有积粪”的做法，已大为改观。

其四为因地制宜、增加复种及推广各类种植：如于稻作区推广小春作物(小麦、油菜等);“山头地角,悉令垦种”;[⑩] 于山区教“种旱稻”;[⑪] 再如讲究地土所宜;“因天之时”;“量地种之”;复增加间作、套作,于‘畔上种瓜’、‘田头植豆’;以及推广良种晚谷、旱禾及

① 嘉庆《四川通志》卷 115，引自鲁子健书，72 页。
② 嘉庆《四川通志》卷 115、116,引自鲁子健书，71－73页。
③ 乾隆《岳池县志》卷 1。
④ 乾隆《石泉县志》卷 1。
⑤ 乾隆《珙县志》卷 4。
⑥ 蓄冬水乃于秋后，“一亩田满蓄二三亩之水，来春傍灌田亩，方得早栽，早栽则不被虫蛀，不被秋风”。以上见乾隆《罗江县志》卷 4,又,冬水田的创行,首见于张文梵《农书》，沈潜（罗江县令）倡行于罗江，同时据沈氏言，德阳县令阚昌言推行‘已有成效’;见乾隆《罗江县志》,嘉庆《四川通志》(鲁子健书，70 页)。
⑦ 乾隆《罗江县志》卷 4 和乾隆《什邡县志》卷 13。引张文梵《农书》。
⑧ 乾隆《什邡县志》卷 13。
⑨ 乾隆《罗江县志》卷 4。
⑩ 乾隆《珙县志》卷 4。
⑪ 《清史稿·循吏二·陈庆门传》。

红薯等。[①] 致使“丝绵菽果之利亦骎骎乎渐兴焉”,[②] 各类农产逐渐兴复、活跃起来。

发展中地区经济的第四个特征是工商业有所发展。清初四川手工业相当薄弱,如夹江“家家纺织,但粗甚”;“至大衣仍资之外省商贾”;[③] 内江仅“以纺织聊生”;[④] 以至有些地方“冬无棉衣衾者十室三四。”[⑤] 乾隆三十年四川总督因“川民不谙纺织”,请“饬各属劝谕乡民,依法芟锄;广招织工,教习土人,并令妇女学织。”[⑥] 同时四川棉纺织业已有发展,如邻水“女子勤纺织,机杼之设,无间寒暑”;[⑦] 康熙时冬而“不衣绵者甚众”的涪州,[⑧] 亦“妇女多勤纺织,中馈井臼而外,专以纺绩为业,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⑨] 而垫江“邑多纺棉,自给而外,率多贩卖,以故垫邑土布远达四方。”[⑩] 同时丝织业也有发展,如中江县养蚕缫丝紬货卖,“近年较多矣”;[⑪] 盐亭“比户机声轧轧,所产甚饶,又名川北紬,远近商贾贸贩云集”,居当地土产第二位,等等。[⑫]

同时期四川商业也有所发展。川民“日用所需,取给场镇,日中为市,以有易无,民咸便之”。[⑬] 明末遭到严重破坏的场市网,至

① 乾隆《罗江县志》卷 4。
② 乾隆《珙县志》卷 4。
③ 康熙《夹江县志》《土产》。
④ 康熙《内江县志》卷下。
⑤ 乾隆《石泉县志》卷 1。
⑥ 乾隆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谕,《清高宗实录》卷 747,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228 页(中华书局,1984 年,北京)。
⑦ 乾隆《邻水县志》卷 1。
⑧ 康熙《涪州志》卷 1。
⑨ 康熙《涪州志》卷 5。
⑩ 乾隆《垫江县志》卷 1。
⑪ 乾隆《中江县志》卷 3.
⑫ 乾隆 51《盐亭县志》卷 1。
⑬ 乾隆《巴县志》卷 2。

十八世纪初叶已基本恢复，其后更有成倍的增加。[①] 商业组织也日趋健全，“红白二花懋迁者皆远方西南商贾，而土人小贩亦有远服贾者。”[②] 如前所述，清初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包括大量外省移民在内的人口增加，从而导致社会需求扩大，对供给形成刺激。但另一方面，同样对发展起到引发作用的，或使包括川外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对四川农家起到作用的，则在于商业流通这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商品产品的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作用，使清代四川经济从早期的（近于）不发展状态中解脱出来，达到一定的水准和得以继续提高。这也表明，虽然传统经济的自足色彩在经济落后的状况下较为浓厚，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否则，这种经济就不可能因外来需求的刺激而做出如上的反应，也不会受到商品交流的引发。正如下节还会见到的，这种商品的流通随着经济的发展愈为扩大，一直把四川的产品送出本省，直至长江下游等地。

经济发展中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风俗渐奢。如巴县“三十年前士庶之家不轻衣帛”，“频年以来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③]；合江“国初居民鲜少，城中比户皆茅茨”；“近日承平日久，乡村亦多瓦屋。”[④] 这表现出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在清代 18 世纪中叶是相当明显的。但另一方面，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源尚未得以充分利用，许多地方还保持着旧的习俗，如人工“怠惰”，“好饮酒食肉”及“游荡好赌”等。[⑤] 总之，发展中阶段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

① 四川在乾嘉年间约有 3 000 个场，根据洪雅、威远、荣县的记载，明代场数约居二分之一，见有关方志。关于清初的遗留情况，见金堂、简州、南溪、石泉、达县、永川、渠县等方志记载。

② 乾隆《资阳县志》卷 2。

③ 乾隆《巴县志》卷 10。

④ 乾隆《合江县志》卷 6。

⑤ 乾隆《罗江县志》卷 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